

日军 **炮火** 下的

陈虹 著 **中国作家**

RI JUN PAO HUO XIA DE ZHONG GUO ZUO JIA

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丛书

南京师范大学“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陈虹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1

ISBN 7 - 80696 - 274 - 3

I. 日... II. 陈... III. 作家—人物研究—中国—1931~1945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8047 号

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

陈虹/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南开区 35 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abcbs@yahoo.com.cn

天津恒宏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 75 字数 35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 - 80696 - 274 - 3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引 言:面对侵略者的炮火	(1)
丰子恺:“还我缘缘堂!”	(24)
叶圣陶:“同仇敌忾非身外,莫道书生无所施。”	(35)
袁昌英:“苦斗着,忍耐着,努力自己的职务。”	(46)
张恨水:“国如用我何妨死?”	(56)
老 舍:“文艺界尽责的小卒”	(67)
王礼锡:他牺牲在“笔游击”的战场上	(79)
巴 金:“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	(92)
臧克家:“叫自己的心受炮火的洗礼。”	(105)
李金发:回到现实中来的“诗怪”	(116)
沈从文:认死理的“乡下人”	(125)
萧 红:“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138)
萧 军:永远的“精神流浪汉”	(151)
艾 青:从时代的“流浪汉”到时代的“吹号者”	(162)
刘白羽:“迈过一道神圣之门。”	(176)
丘东平:一手握笔一手持枪的文艺战士	(186)
孙 犁:他来自冀中抗日根据地	(197)
林语堂:“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	(209)
郁达夫:“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	(221)
萧 乾:“我是一个不带地图的旅人。”	(232)
戴望舒:他从“雨巷”中走出来	(243)
许广平:她经受了“凌辱的试炼”	(257)

2 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

关 露：“在偷偷地活了之后又偷偷地死去。”	(266)
张爱玲：1941年12月8日那天她在香港	(278)
周作人：面对威胁与恐吓他跪下了.....	(287)
郭沫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298)
茅 盾：一名“党外人士”的抗战足迹	(312)
夏 衍：“我真心实意地爱上了新闻工作。”	(323)
田 汉：“且把犁锄收拾好，故乡犹有未耕田。”	(337)

附录：

抗战期间纪实文学作品中的日寇暴行	(351)
从抗战初期的报告文学看中国作家的群体心态	(363)
抗日战争中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小议《蜕变》、《法西斯细菌》、《岁寒图》	(375)

后 记	(388)
-----------	-------

引言：面对侵略者的炮火

听！抗战的号角吹响了，
民族解放的黎明逼近了。

悠长的黑夜走完了它的尽头，
奴隶的滋味我们已经尝够，
曙光驱散了中古黑暗的梦，
鲜血写成中华民族的平等自由！^①

这是1937年7月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之时，诗人们流着热泪写下的诗句。从这一天起，中华民族开始改写了她以往的历史；从这一天起，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改写了他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历史。



这段历史深深地镌刻着战争留给中国作家们的沉重印记。

这毕竟是一场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战争，也是一场施暴者露出其猖獗与狰狞面目的战争。仅以中国方面的损失为例，在短短的八年期间，军民伤亡的总人数则高达3500万以上，财产的损失亦有600多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间接的损失，即达到了5000个亿（按1937年的美

^① 冯乃超：《诗歌的宣言》，载《文艺》1937年第5卷第3期。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上海市民逃难的情形。

采自新华出版社《日本侵华图片史料集》

元计算)^①!

在这场生灵涂炭的战争中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同所有的平民百姓一样,无不遭受着肉体上与精神上的摧残与迫害。尤其是作为自由职业者的作家们,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和性质,使得他们更加具有了一定的代表性——第一,他们既没有坚实的单位做靠山,也没有固定的薪俸做后盾,因此基本上都沦入了穷乏清苦的“难民”以及无枝可依的“流浪汉”的队伍之中;第二,由于他们每人的手中都握有一支赖以生存的笔,并随时随地地记载下了自己的颠沛行迹与心路历程,因此在客观上即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又一份有关战争的以及他们各自心态的弥足珍贵的“史料”。

这是尚未沦陷的地区,人们终日忍受着日本飞机的轰炸——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625页。

你知道炸弹在你近处落下的时候所发出的那种和空气摩擦的“哗哗哗哗”的声音吗？这惨厉的声音以一种可怕的力量，深压到每个被威胁者的灵魂深底，在这一瞬间使你失去思考的余裕，闭着眼睛等着，也许下一瞬间你的生命就会这样的消去！接着，是震破耳膜一般的轰响，窗格震动，玻璃裂响，一两秒钟之后是一阵灰黄色的烟，冲鼻子的是一种泥土和火药气混在一起的使人喷嚏的臭气……当然，在这几秒钟间，几十几百也许是近千的生命是像蝼蚁一样的消失了！^①

这是已经沦陷的地区，人们真正地成为了亡国奴——

……四块钱换来了两块白布上面印着皇军顺民的通行证，张德还设法得来了两张临时应役证，那是用了十块钱托人换来的。含着眼泪在臂上缝好通行证，咬着牙在（1937年12月）17日下午走到（南京的）马路上。

马路两旁的景物，完全改变了。残余的火烬尚在继续半熄半燃的烧着。到处都可以看见紫红色的血渍。在太阳旗帜下的魔鬼们，随时随地都有刺杀我们的可能。我们除了低着头怀着不宁的心情向前走去，对于别的我们再也不能顾虑了。

盘踞中华门的是八个凶横的敌人同两个汉奸，当我们把应役证缴验以后，全身被搜查一下，随即被释放出来，低着头从敌人刺刀下钻出破毁的城门。但是在我们后面的一个妇人，却遭受了无端的耻辱。^②

1946年一位名叫威廉·尼德兰德的精神病专家——也是来自纳粹德国的流亡者，在经过了多年来对于集中营幸存者的临床观察之后，

① 夏衍：《广州在轰炸中》，载《新华日报》1938年6月12日。

② 汝尚：《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载《七月》1938年第2集第2期。

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他们的身上存在着“幸存者综合症”。其症状主要有:慢性焦虑症、恐惧症、快感缺乏症(不能体验快乐)、孤独症、疲劳症、臆想症、怀疑症等等,甚至还有的人会产生幻觉以及人格分裂等症状(对自己评价的改变导致对自我存在的真实感的短暂消失)^①。固然,这些并不一定适合中国人的具体情况,但是对于战争,对于屠杀,其恐怖的情绪则是每个人无不具有的。女作家白朗即于死里逃生后详细地记载下了重庆市民面对敌机轰炸时的真实心态:

……市民们已经变成惊弓之鸟了,走在街上的人,都露出了极度张惶的神色,尖侧起耳朵,同时观察着每个行人的动作和嘴巴,只要有人喊一声“警报”,或是汽车喇叭的遽然长鸣,人们就会飞跑起来,一个跑,大家都随着狂奔,店铺的门板也在混乱中紧闭了。^②

因此,尽管这些作家们没有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写出这一感受如何成为了从此以往难以消逝的“印记”,抑或是某种幸存者们的“综合症”,但是有无这九死一生的经历,则无疑成为了检验每一位中国作家情感与立场的试金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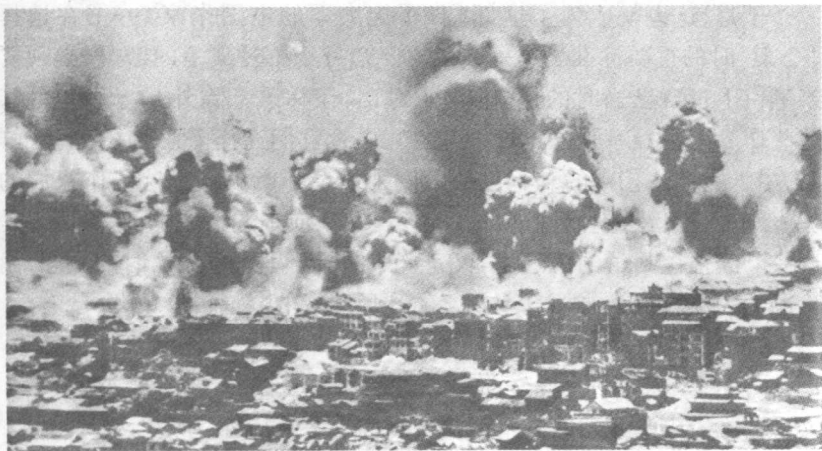
林语堂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中国所有的著名作家当中,林语堂是唯一的一个没有直接经受过炮火威胁的人物——早在1936年的8月他即应赛珍珠的邀请,跑到太平洋的彼岸去写他的大作去了。尽管后来他也曾两次回到国内,但是均如蜻蜓点水一般,没过多久便又逃走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既没有尝受过血肉横飞的轰炸,也没有经历过背井离乡的逃亡,则无疑给这位“隔岸观火”者的思想带来了与众不同特点,也使他的行为染上了令国人难以理解的色彩。例如,他竟提出了要以幽默为“武器”,来拯救中国,拯救世界。又例

① 威廉·尼德兰德:《受害者的精神失调:对集中营病理学及其后遗症的理解的贡献》,转引自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1页。

② 白朗:《在轰炸中》,载《抗战文艺》1939年第4卷第3、4期合刊。

如，就在大敌当前之际，他居然一心钻研起了有关人类文明的走向问题——“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跑到重庆的中央大学作了题为《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的讲演，跑到西安的青年堂作了题为《中西哲学之不同》的报告，还跑到长沙的中山堂作了题为《论月亮与臭虫》的演讲……他的目的无他，只想为中国的新文化及人类的新文明而催生。然而重庆也好，西安也好，长沙也好，只要是在当年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广大的黎民百姓无不在为日本飞机的轰炸而发愁，为日本军队的暴行而愤怒。为此郭沫若、田汉等诸多作家们愤然而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运动”。

其实从本质上来讲，这位书生气十足的林语堂还是非常爱国的，他不仅在海外积极地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而且还向国内捐赠了大批的钱财。那天——1945年的9月2日，日本天皇的代表终于在投降书上签字了，林语堂兴奋得泪流满面，他带领着全家老小走上了纽约的街头，汇入了华人们庆祝抗战胜利的游行队伍……但是不管怎么说，有没有亲身经历过战火的考验，亦即内心深处有没有那种由“切肤”之痛而烙下的“印记”，这对于不同作家来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1940年6月28日，86架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轰炸，其旧城区几乎全部为大火所焚毁。采自新华出版社《日本侵华图片史料集》

当年只要是生活在自己国土上的作家们,又有哪一个人抑或他们的家人没有遭受过日军暴行的迫害?——郁达夫的母亲为了躲避日本军队的扫荡,冻死饿死在荒山之上;冯英子的妻子和弟媳没有来得及逃脱,遭到了日本兽兵的野蛮轮奸;丰子恺以其半生心血建筑而成的“缘缘堂”,于轰炸之中变成了一片废墟;丘东平则直接倒在了侵略者的枪口之下,身边的挎包里还摆放着一部未完成的书稿……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讲,灾难似乎成为了一种“财富”,没有亲身经历过这场战争灾难的人,则无法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自称是“身经百炸”的巴金最后说出了这样的话:“一个人看见‘死’太多,他对‘死’便不感到惊奇;一个人有‘死’的机会太多,他就不怕‘死’。他用不着去思索‘死’,他会把他的全部精力用来对付‘生’的事情。他做事更努力,更负责。”^①

——死里逃生的夏衍最后也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是一向怕看死人,怕看人血的,可是现在,我能够在尸场上慢慢地走,我能够踏过那涂满了街道的‘血路’了,不踏同胞的无辜的血,是不能通过罹灾区域的!残酷吗?不,这是感觉的麻痹,这是对于恐怖的感受的疲劳和饱和!”^②

于是,这也就成为了这部《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一书在选择“个案”时的重要标准之一——必须要亲身经历过战争的磨难,必须要亲笔留下过自己当时的记录(为了对比,仅林语堂除外)。毋庸置疑,这些作品无不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尽管它们充满着恐怖,充满着鲜血,尽管它们从艺术的和审美的角度来说都不能算是这些作家们的代表作,也不曾被他们选进自己的各种文集或是选集之中,但恰恰正是这些已经被尘封了的记录,不仅完整地保留下了作家们当时的心态,而且也无一不可作为有关日军暴行的弥足珍贵的“铁证”。

二

这段历史深深地镌刻着中国作家们的心路历程。

① 巴金:《广州在轰炸中》,收入《旅途通讯》,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版。

② 夏衍:《广州在轰炸中》,载《新华日报》1938年6月12日。

依照当今学者们的划分,20 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大致可以分为六代——以 1949 年为界,前边有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后边有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①。那么其中出生于 1880—1895 年之间的第二代和出生于 1895—1930 年之间的第三代,则无一遗漏地都在自己最具生命力的时期也是最出成果的时期遭遇到了这场由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因此对于他们这一个个的“个案”来说,其关注的重点便不仅仅是他们的经历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心灵深处的创伤——即作为一名“抗战中”的作家,他们在握笔时的“冲动源”与“触发点”。

何以言此?情感决定着创作,心态也决定着创作。只有抓住这一“视点”,才能够真正地理解他们,真正地理解他们的作品。夏衍曾在他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纯属于心理学方面的例子:“……杭州多雨水,特别是黄梅天,可是直到 20 岁毕业,我始终买不起一双‘钉鞋’(当时还没有皮鞋,更没有胶鞋,下雨的时候,除了赤脚,就穿钉鞋,这是牛皮做成而在脚底上有铁钉的雨具)。因此,每逢下雨,布底鞋总是浸透,又没有替换,要一直穿到它自我干燥为止。这种又湿又冷的滋味是十分难受的。大概这件事对我印象太深,所以直到老年(到十年浩劫时),每逢伤风感冒,或者别的毛病发高烧的时候,我总是反复地做同一个梦,就是穿着湿透了的鞋子在泥泞里走路。”^②

这属于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依照弗洛伊德的“意识心理学”的理论,他则将人的心理活动分为三个部分——潜意识、意识和前意识。所谓“潜意识”,是指不能被人们自我感知到的那一部分心理活动,例如本能的欲望,或是已经被遗忘了的童年的情绪体验等等。它们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被压抑起来,但是它们却有着强烈的冲动,这便是人们大部分行为的动力所在,也是“意识”所产生的重要基础。至于“前意识”,则是指当前虽然未被注意到的但是一经提起和追忆就可以

①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第 82—83 页。

② 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 1985 年第 1 版,第 32 页。

立即被知觉的那一部分心理活动。它起着中介的作用——即“潜意识”的欲望是通过“前意识”的审察和认可而进入到“意识”当中来的。

这便让我们明白了夏衍的那个梦,同时也明白了许许多多的人为何能够终生感受着日本侵华战争所带来的创痛。张贤亮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他是南京人,1937年11月日本军队兵临城下时他还不满周岁,也成为了逃亡大军中的一名最小的成员。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母亲奇怪地发现自己背上的小儿子一直哭闹不休,解下背带一看,这才发现原来是脚上的鞋袜不知何时全都脱落了,一双赤裸的小脚在凛冽的寒风中冻得又红又肿。张贤亮这样写道:“自此以后,我有个与别人不同的习惯,就是总穿着袜子睡觉,夏天也必须如此,因为我的脚非要严密包裹起来才能捂暖。”^①

看来,这就是一种潜意识,和夏衍梦中穿湿鞋一样的潜意识。它的“应激源”不是别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就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流亡和逃难,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噩梦与终生的创痛。11个月大的张贤亮应该说是没有记忆的,但是他的这双脚却让他一辈子也忘不掉这段苦难的历史。同样的道理,当年只有3岁大的赵鑫珊也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顽童,但是他也偏偏记住了家乡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时的惨景——“火光冲天,街上陈列着尸体……”^②

孩童们尚且如此,成人们的内心又将是如何的呢?

老舍是这样形容他遭遇敌机轰炸时的感受的:“落弹时那种吱忽吱忽的呼啸,是我平生所听见过的声音中最难听的。没有听见鬼叫,这大概就很相似了……这是轰炸。这只教你有一口气便当恨日本,去打日本。”^③

夏衍是这样形容他死里逃生后的感受的:“不亲身经历过,是不会理解轰炸人口稠密都市的残酷和恐怖的……这是一种人间地狱的情

① 张贤亮:《我为什么不买日本货》,收入《张贤亮近作》,珠海出版社2002年第1版。

② 赵鑫珊:《不安——人性与不安或者不安的人脑根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56页。

③ 老舍:《轰炸》,载《文艺月刊》1938年第2卷第1期。

景！我依旧要说，不亲身经历过是不会理解的。”^①

许广平遭受过日本宪兵的毒刑拷打，她是这样叙述自己的体会的：“只要有谁走入过这种人间地狱的，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每个囚徒几乎都有他一大串的惨苦经历，每夜隐显的受刑不堪的惨苦哀号，应和着啪啪的抽鞭子声，大家心灵上的窒闷，人类同情，免死狐悲之感，以及每天每次大门锁声响动，心中随着不由卜卜地乱跳等等的不断精神的虐杀，真可以令人发狂！”^②

.....

对于每一位亲历者来说，这都是一段永生难忘的记忆。它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潜意识”或是“前意识”，就是因为在人类所具有的各种情感当中它们的“强度”超过了一般——据西方学者普鲁奇克的实验数据表明：愤恨和恐怖的强度均为 10.13，而爱的强度竟远远不如之，只有 9.73^③。专门研究二战期间犹太人被屠杀历史的美国心理学教授阿伦·哈斯，曾经采访过这样几位幸存者：一个说，他只要一看见起重机就会想起大屠杀，因为当年他在集中营时亲眼目睹了被起重机吊死的犯人；一个说，只要他一看见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的人群，就仿佛又看到了毒气室门前那个长长的队伍；还有一个说，当他补牙时，钻机一响，他便立刻感觉到似乎又闻见了法西斯分子在索比博焚烧犹太人尸骨的气味……因此，对于战争和屠杀——这个最为重要的社会性的“应激源”来说，它给人们带来的“应激反应”是非同小可的，除却生理的之外，更有心理的，否则阿伦·哈斯是不会在他的《大屠杀后遗症》中写下这样一句话的——

消灭人的肉体要比消灭他的记忆容易得多。^④

由此可见，这是一场考验每一个中国人的意志的战争，也是一场决定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的战争。对于作家们来说，它的意义更不同于

① 夏衍：《广州在轰炸中》，载《新华日报》1938年6月12日。

② 许广平：《遭难前后·凌辱的试炼》，上海出版公司1947年第1版。

③ 转引自福井康之《感情心理学》，1991年日文版，第107页。

④ [美]阿伦·哈斯：《大屠杀后遗症》，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页、第138—139页。

一般了,因为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代表着社会的良心,担载着文化的传承,涵养着民族的精神,肩负着无可逃脱的家国意识和天下兴亡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共产党员郭沫若的态度是:“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

老作家叶圣陶的态度是:“同仇敌忾非身外,莫道书生无所施。”

诗人臧克家的态度是:“叫自己的心受炮火的洗礼。”

就连被左翼作家们斥为“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张恨水也发出了这样的誓言:“国如用我何妨死?”

当然,除此之外也有着别样的声音——以冷漠而著称的女作家张爱玲的态度是:“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比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睬。”^①而最终成为了文化汉奸的周作人的态度则是:“和日本人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②

.....

就这样,战争制造了人们的心态,心态形成了作家们的作品。于是这部《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一书就从这里入手——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入手,从作家们对于这一生死考验的反应入手,去分析他们的心理,去分析他们的选择,去分析他们从今往后的不同命运,同时也去分析由于不同的心理和选择而给中国现代文学所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三

这段历史深深地镌刻着中国作家们的颠沛流离的行踪。

固然,战争只是一个外力,对于这个外力,所需要的则是人们为之而做出的主观方面的选择。

① 张爱玲:《烬余录》,收入《流言》,五洲书报社 1944 年第 1 版。

② 转引自郑振铎《惜周作人》,收入孔庆东编:《自己的园地——关于周作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第 1 版。

根据心理学家的分析与研究,在“应激反应”中影响到主体的条件一共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个人的身体素质;二是个人的发育过程;三是个人的人格特点——其中又包括着反应类型、应对能力、价值判断与认知方式,以及身心的状态等等。但不管怎么说,如今所出现的这一“应激源”毕竟是有关民族存亡的头等大事,古人尚且懂得“匹夫有责”,今天的知识分子则更是不需要去进行公与私的权衡、利与害的比量了。这是老舍当年写下的一段文字,它足以代表了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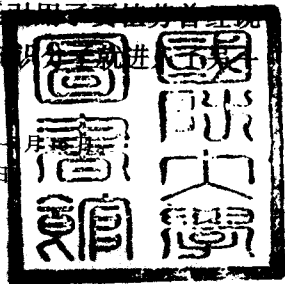
我着急,而毫无办法。战事的消息越来越坏,我怕城市会忽然的被敌人包围住,而我作了俘虏。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们捉去而被逼着作汉奸,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头盘旋。是的,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银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一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去。^①

于是乎,面对着大敌当前的严峻局势,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作家们全都认真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其一,奔赴延安或者其他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寻找共产党,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其二,转移到大后方,亦即俗称的国统区,去继续开展抗战文学运动;其三,流徙于海外,去开辟抗日救亡的新战场;其四,坚守在已经沦陷了的地区内——“让我在这里等待,/ 耐心地等待你们回来:/ 做你们的耳目,我曾经生活,/ 做你们的心,我永远不屈服。”^②

但不管是哪一种选择,都同样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也就是气节的考验。为此,钱理群称呼这一时期的作家为“流亡者”,这一时期的文学为“流亡者文学”。他甚至引用了曹植曾经说过的话:“大约自1937年抗战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进

① 老舍:《八方风雨》,连载于北平《新民报》1946年4月4日—

② 戴望舒:《等待(二)》,载《新生日报·新语》1946年1月5日



个时代,再也没有窗明几净的书斋,再也不能从容缜密的研究,甚至失去了万人崇拜的风光。‘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文化革命改造世界的豪气与理想早已梦碎,哪怕是只留下一丝游魂,也如同不祥之物,伴随的总是摆脱不尽的灾难和恐怖。抗战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只能在污泥里滚爬,在浊水里挣扎,在硝烟与子弹下体味生命的意义。”^①

首先,以选择根据地归宿的那批人为例,除了少数的一部分人留在延安外,更多的人所面对的无疑就是战场,就是敌人。从海外归来的王礼锡曾经率领着一支由十余人组成的作家战地访问团来到了中条山前线。这里有炮火的威胁——“……我们进到了横岭关炮火射程内的地区了。当我们摇鞭策马前进的时候,敌人发炮了。一连至少发了二十余炮,每一个炮响,我们就看见滚起一阵浓烟。我们都把大圆草笠摘下,拉长行列,驱马急驰前进”^②。这里有行路的艰难——“……黑云掩蔽了太阳,豆大的雨点,稀疏的从阴黑的天空散落在每个人的衣上。雨下了半点多钟,自头发到鞋子,每一个地方都拧得出水来。大家若无其事的向前走。半点钟后,太阳出来了,再过半个多钟头,衣服就在身上晾干了。一阵干,一阵湿,我们这一个多月以来,这样的生活是很平常的”^③。就为了这种“平常”,年仅39岁的著名作家王礼锡最终病逝在奔赴前线的路途之中。

应该说对于这种牺牲,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十分明朗的。萧军与萧红就曾为了是否去前线引起过一场争执,从中足可见其一斑:

“你总是这样不听别人的劝告,该固执的你固执;不该固执的你也固执……这简直是‘英雄主义’,‘逞强主义’……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底年龄,你底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

① 钱理群:《“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收入《钱理群文选——拒绝遗忘》,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② 王礼锡:《笔征日记(1939年8月2日)》,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③ 王礼锡:《笔征日记(1939年8月12日)》,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是你自己的呢。我也并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以致引起你的憎恶与卑视……这是想到了我们底文学事业。”

“人总是一样的。生命的价值也是一样的。战线上死了的人不一定全是愚蠢的……为了争取解放共同奴隶的命运，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底‘天才’，谁又该去死呢？”

“你简直……忘了‘各尽所能’这宝贵的言语；也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①

可见“牺牲”一词并非是耸人听闻。王礼锡为之付出了生命，丘东平也同样将自己年仅31岁的青春献给了这场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和王礼锡一样，他本可以活得好好的，住在大城市里写他的小说；他本可以生活得非常幸福，守着妻子和儿女，享尽天伦之乐。但是他却选择了部队，选择了打仗，与此同时也就是选择了自己的最后归宿。他不会遗憾的，因为他早在1937年淞沪战役中就说过：“我的灵魂已经很坚定了，我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预备着敌人对我的侵袭。”^②

其次，再以选择大后方为归宿的那批作家们为例，他们同样面临着逃亡途中的艰险，空袭当头的惊恐，以及一贫如洗的考验。

画家与散文家丰子恺的逃亡，前后一共历经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及路经七个省数千公里的路程，他的队伍共有十余口人——最小的3岁，最老的已进入耄耋之年。萧乾的逃亡，则是充满了恐怖——“船一开出‘公共租界’，就进入了战区。炮弹从黄浦江西岸在我们头上尖声飞过，江面上一片硝烟。这时，舱里已挤不进去了。我们两人就躲在甲板一个角落紧紧抱在一起。她浑身打着哆嗦。我为了给自己壮胆，就哼着电影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的声音也是颤巍巍的。那可真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③

来到大后方后，也并非进入了保险箱，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使这

① 萧军：《侧面》，收入《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② 丘东平：《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载《七月》1938年第9期。

③ 萧乾：《逃难记》，收入《我的中国，我的岁月》，台湾皇冠出版社1994年第1版。